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〇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六期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11d)

【往事追忆】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革命群众对吴芝圃大刮浮夸风的声讨	武彩霞
【运动记愧】	历史深处的来信	朝格图·杨继斌
【不堪回首】	红卫兵忏悔记	王波
【博客文选】	南方周末的头版文章震动我的心	中华新青年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革命群众对吴芝圃大刮浮夸风的声讨

• 武彩霞 •

文化革命一开始，作为河南省最高学府的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在郑州大学引起很大反响，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晚上，中文系一年级李学生、王相海、席占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的错误做法。接着，政治系七人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夜，校党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组杨蔚屏（省委书记处书记）汇报情况。杨蔚屏说：“省委是相信郑大党委的”，“你们不是陆平，怕什么？”有了省委的表态，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1.要立即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2.不准进行串联活动；3.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6月3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

了。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对率先写大字报批评党委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王相海、席占修还被拉到桌子上斗争，让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见《郑大联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郑大联委劲松战斗队1967.7）。

6月6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下午，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6月9日，学生、共青团员张凤芝（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写了《绝命书》，决定走王相海自杀的路，后因被同学发现，未遂。

6月18日晚，在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的带领下，部分学生去找系总支书记张××，又到“高干院”（即校领导住处）找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均未见到，就自动聚集到文科楼前（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当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郑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维钧、贺长有等11位同学向中央发电报，说王培育反击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

6月20日，省委对郑大工作组加派力量，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亲自坐镇。赵文甫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对邵维钧、贺长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进行反击：对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利用同学们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翻查邵维钧、贺长有、李春兰三同学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开辟专栏大字报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召开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会议，号召全校揭发他们的“错误”。工作组长党若平甚至说过“对邵维钧等同学，什么时候有空隙，就踢他们几脚”的话。在对邵维钧等同学施压、批判的同时，还对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采取歧视、冷淡的态度。这种作法从一个班扩大到一个年级，使不少同学受到株连。（见党若平：《省委前驻郑大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上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1966年11月8日）6月21日，中文系决定全系声讨王培育，人已召集齐了，赵文甫不让开声讨大会，改成分班揭发、批判，引起同学的不满。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组即将撤离之际，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工作组在三天之内，仓促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校文革”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正、副主席和党组成员名单，由工作组主要领导人酝酿之后提名通过。一直到8月4日，工作组还派人帮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着“参谋”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决定撤销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省委为王培育平反）、改组郑州大学党委。《河南日报》对此作了消息报道，同时发表社论：《一场针锋相对的夺权斗争》。报道中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后，广大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声援北大同学的革命行动，中文系一年级2班李学生等14名学生写大字报，批评他们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讨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错误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刚刚燃烧起来，对校党委的问题才开始揭露，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就暴跳如雷，惊慌万状，他们急急忙忙于布置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他们把大好的革命形势，说成是“像1957年那样的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把革命的师生诬蔑为“右派势力”和“别有用心分子”，把革命的行动，诬蔑为“向党进攻”，对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的师生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报上签

名的人写“检讨书”；对批评校党委的学生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有四名团支部书记被撤了职……。在历数了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罪行”后，省委号召：郑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要一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务必将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彻底查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于河南省委的这一决定，郑大部分师生认为，揪出王培育值得庆贺。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问题，犯了严重右倾思想错误，是“替自己开脱应负的责任”。

8月1—3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了《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见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创刊号66.8.10）。信中以真挚的感情反映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摆事实、讲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郑大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犯了严重错误。8月2日，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写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的大字报。同日，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则针锋相对，认为：“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8月6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运动。

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党言川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党言川等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上百人前来参加。刘建勋和其他省委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联委”同学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校文革”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把强行主持“联委”会议被赶下台去，说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群众高呼“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等口号。接着，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进行围攻斗争。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来到郑大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次日，刘、纪等再次来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肯定党言川等少数派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党言川等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同时，也遭到“校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对刘建勋支持党言川提出疑问：“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

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项‘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1966年年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1966年9月3日，在“联委”发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

9月4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9月5日，“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再次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悲惨历史”，由于吴芝圃已调离河南，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9月7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

66年9月9日，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宣告成立。其负责人是“校文革”正副主席彭学敏、郑毅涛。这时候，党言川的私人信件被披露，再一次让“战斗师”抓住了“把柄”。

66年8月下旬，新乡师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该院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拿出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1962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就进行拍照后送给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9月初，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并由公安厅白副厅长放大保存，后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对农村 58—59 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 58—59 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此后，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

对于“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件》，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也认为有“原则错误”。在“联委”主持召开的 9 月 5 日大会上讲话表态“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

在“战斗师”的重炮轰击下，“联委”于 9 月 25 日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狠批猛攻。66 年 9 月 19 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而省委对“郑大联委”的继续支持，也基于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对立派却认为，“党言川之流”已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刘、文、纪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

66 年 9 月 15 日，“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简称“造委”）宣告成立。负责人是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张书震，还有马鸿勋、杨钦宝等。从《宣言》中看出，“造委”和“联委”大方向一致，自然是“战略伙伴”关系。可是，既然方向一致，为何另起炉灶？这得从“造委”负责人张书震说起。张书震文革前就是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初期，是院党委的红人。随着运动的深入，张书震和部分同学认清了院党委、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面目，决定当造反派。可是，对“联委”的一些做法有不认同（如《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信件”中关于“三面红旗”的看法），于是，这些人就拥戴张书震成立了“造委”。66 年 10 月 15 日，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和“联委”、“造委”并肩战斗。

1967 年 1 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保守派“战斗师”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

1 月 22 日，来河南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唐×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出了《27 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

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老帐？……省军区公开支持唐×，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唐×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造反派出现了分歧。“郑大联委”等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唐×是“清华井冈山”的“冒牌货”，郑州工学院“造反派”等却和军区保持一致。

1967年2月3日，发生一件趣事：“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的任延庆，冒充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混入“郑工造反派”主持召开的大会会场，被认出后，当场揭穿，送号“冒牌驴”，并被带到军区照相。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四处散发——从此，“老冒”就成了任延庆的代号（详见附件三）。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是大势所趋。郑州地区造反派在大联合中产生分歧，军队的介入使之迅速分裂。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于2月7日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在省军区的支持下，“郑工造反派”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十大总部”联合起来，镇压“二七公社”。

2月9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根据刘建勋到北京后的表现和北京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对刘建勋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2月10日，“郑大战斗师”在行政楼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铅印大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文、纪是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为内容。

2月13日晚，“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或“郑大革联”。14日，党言川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驻军、“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清华学生唐×在会上发言，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会后，赵文甫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郑州晚报》1967年3月10日第3版）：

1. “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

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

2.“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

3.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

4.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中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厅保守组织）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军区直属机关披露一份“二月黑风”中的“黑名单”，是从军区参谋长东××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抄下来的。当时是为随时抓人准备的。其中有“郑大联委”16人：党言川、方复山、任延庆、唐伯绪（唐一兵）、孟福海、殷树山、杜秀萍、梁国喜、席占修、袁宝珠、刘玉钦、余明相、张松玲、李玉芳、李庆云、李长杰、王志亭。名单中有的人被抓起来，有的人及时逃离河南。后来，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预，军区才有所收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可是，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竟然支持“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〇”、“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原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依群，曾写过一组诗词，取名《抗逆小集》，可作为河南“二月黑风”的佐证。如：1.五月吟：刀光剑影遍街头，烈火频烧二七楼。热血横流何所惧？红旗依旧傲中州（1967.6.2）2.水龙吟：堪恨河南刘邓，枪口对二七战友。二月黑风，几番血案，频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树，何伤之有？听中州子弟，凯歌高唱，共风雷吼！（原载《革命造反报》郑大联委主办，1968.2.7）

后来，经过“二七公社”艰苦不懈的斗争，在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总理的干预下，被捕头头得以释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进京汇报会。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军区在给中央的检查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军区的检查等于给“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郑州大

学成了“联委”的“天下”，声讨何运洪的罪行、敦促战斗师“反戈一击”、批判刘邓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声讨会上声泪俱下，批判会场口号震天。在“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31期（67.9.1）头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写道：“郑大面貌焕然一新。被战斗师拆毁的大字报栏又林立在校园。大字报、大标语、巨幅宣传画，琳琅满目。看大字报的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个校园充满了火热的战斗气息。”“二月黑风”中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内幕被揭露出来，证据确凿，骇人听闻。被军区逮捕迫害的“联委”同学，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二七联络部在二七纪念堂召开“控诉何运洪滔天罪行大会”，特邀郑大外语系学生杜××介绍“郑大联委”斗争史，特别是她“二月黑风”中被捕坐牢的情况，十分感人。

1967年11月1日，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党言川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由龚依群、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担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还有程天富、马鸿勋、刘作周、方复山、唐一兵、孙日新、李恒福、袁宝珠。接着，各系革委会相继成立：数学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占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树山；化学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韩立忠。还有物理系，主任侯德臣；历史系，主任：余明相；外语系，主任李杰。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郑大。9月26日，郑大联委宣布撤销。11月1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郑大。

1968年8月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开展，党言川等同学相继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郑州的专车上接见刘建勋和纪登奎时，还问到“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这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党言川。

以上关于郑州大学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据笔者所存资料，其准确性、完整性远远不够，诚望郑州大学文革亲历者，给予批评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附件一：“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文革时，党言川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初期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的围攻、压制，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后成为“郑大联委”负责人。1967年2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后，说党言川是刘建勋的“保皇派”、“反动学生”。3月6日，省军区召开10万人大会，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会后，用飞机散发《告全省人民书》等传单。3月9日，党言川被捕。由此，“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顺口溜。

在“河南造总”夺权主办的《郑州晚报》上（1967.2.12）登载有一首小诗，是3月6日在飞机上执行撒传单任务的一个战士写的。题目很美：“春光无限好”。诗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欢呼 / 奔腾的黄河在欢笑 / 与坐在机舱里的战士 / 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思潮…… / 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动？ / 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热情这样高？ / 是这堆满机舱的传单啊 / 把我的心与革命左派的心紧紧相交 / 《告全省人民书》是大夺权的进军号 / 我们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臭斗倒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 表达了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导 / ……千万张传单飘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种 / 在革命左派的心窝里扎根长茂。”……

毋庸置疑，在战士的心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左派”是光荣的，而承担“飞机撒传单”的任务更是神圣的。所以，诗中表现出来的真诚、自豪、激动、愉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战士的心是洁白无瑕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这位战士也不会真正明白。时隔4个月，河南省军区向中央作检查，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镇压了革命左派”，飞机撒传单显然是错了。后来，党言川担任了郑大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滑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再后来，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党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阶下囚，撒传单这件事又成了万分正确。——就这样反反复复，构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

附件二：奇文共赏——《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文革中以长篇小说形式描写对立派组织的作品并不多见。在笔者的藏品中，有长篇小说连载——《郑大联委兴衰演义》第二回，油印，16开。虽然没有全本，作者、时间不详，但从内容上来看，显然是对立组织所作。细读之，语言精炼、幽默，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对党言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假如笔者当时读到此文，一定会称其为“大毒草”的。如今，文革已成历史，党言川已经作古，功过是非，历史自会有公论。试想当年两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写出这样的文字实在不足为怪。

这里节选片断，写的是1966年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到北京告状和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车回校后的事情。文中“凹面官人”是指刘建勋，“文大老爷”是指第二书记文敏生，副书记杨蔚屏冠以“黑货”，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冠以带引号的“好同志”……看官注意：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这一特殊年代，不然的话，这样丑化省委官员，那还了得！

《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第二回 刘、文、杨应邀赴会 党言川打人起家

话说车门开处，托地跳出一位青年来，颧骨高高，下巴尖尖，一副金灿灿的深度近视镜，神奇的座在鼻梁之上。众人一见是党言川，怎禁得住一声喝彩道：“好齐整的一条闯将！”这时只见一位女士抢上前去，一面接过言川手中之书包，一面说道：“哎呀！你可回来啦，言川！”在众人喝彩声中，悄悄地从车中又钻出“文联”的哼哈二将：一位大眼，尖脸，姓方名复山，字号石波，外人讥为“保皇先生”者。另一位，小眼，矮个儿，黑瘦子，姓刘名松盛者是也。问问知其底细者，无不啐道：“好个政治投机分子！”

欢迎仪式之后，早有一群人拥簇着往楼里而去。人声嚷闹，话不尽相逢之喜，就中一位兄弟高叫道：“言川哥，想煞俺也。”正说话间，一声喇叭响亮，众人回望阶下，只见那小卧车掉转头，砰砰煽出一股黑烟，急匆匆告别“皇”亲而去。

见缝插针儿。如今且借党言川在楼梯上讲演之际，说话人交代几句：这许多欢迎党言川的同学中，多数还是革命或者要革命的，他们不同意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了校文革，要自己起来闹革命，好得很！但不合信错了党言川，受了欺骗！后来有人写诗叹曰：

不看衣着不看容，只看他心红不红；
交了好友同进步，碰上扒手害非轻！

且说中午宴罢，只见一个个往校门外机械厂去了。共是三十多条好汉。相见毕，党言川径自取了一块半截砖朝屁股下一塞，便宣布会议开始。好言川，端的了得！不到一个午休时间，就把晚上要开的“赴京报告会”安排得停停当当：你贴海报，他送通知，并组织了大会主席团

和保卫人员。党言川心怀鬼胎，私下对几个心腹说道：“咱不好好干，将来就被划成右派”，几个人听罢，叫将起来：“阿川你放心，凭咱十八般武艺，又有书记刘……”，党言川连忙打断：“不可声张！”于是几个人便小声说道：“又有刘书记……，管保弄个左派当当。”党言川闻言，顿时眉开眼笑，又叮咛一番，不在话下。

说话间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大操场人山人海，要听北京经验。……

这当儿，只见主席台北边一阵骚乱，闪过来四抹黑影。灯光下，只见是：凹面官人、文大老爷、“好同志”纪登奎和黑货杨蔚屏。凹面官人还致了词，说了些“大力支持”、“由群众解决”一类的吉利话。这话有甚厉害处？是你有所不知，这官家封过的敢字当头的小将，谁敢动他一下？切莫说他与这位官人又恁地要好！此是后话不提。

附件三：关于党言川的漫画

文革中漫画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被群众组织广泛应用。这组传单形式的漫画产生于1967年2月，4开，铅印，共9幅。传单名称：《彻底揭开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盖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传单署名：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韶山》革命造反队。

产生背景：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运动后，把省委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视为“走资派”，把郑大造反学生党言川视为“保皇派”。这组漫画就是以“刘、文、纪”和党言川之间的所谓“主仆关系”、“秘密勾当”为内容而绘制的。

对于漫画的内容，笔者不能苟同，但绘画水平却令人叫绝，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党言川，个个形象逼真，惟妙惟肖。从收藏角度来看，不失为精品。

附件四：“冒牌驴”绰号的由来

文革时，任延庆是郑州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联委”主要负责人之一。1967年1月，清华学生唐×以“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写出《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郑州地区造反派在此问题上发生分歧。以“郑大联委”为首的多数造反派组织认为“清华驻郑联络站”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唐×是“冒牌货”。2月3日上午，支持唐×观点的郑州工学院造反派等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炮轰省市大会”，“郑大联委”等被挡在会场之外。任延庆灵机一动，戴上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进入会场，后被战斗师同学认出，当场被扭送到军区，照了相。何运洪政委指示铅印传单数千份。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在郑州地区如雪片般大量散发。

“冒牌驴，冒牌驴，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顺口溜广泛流传。从此，“冒牌驴”成了任延庆的代号。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对任延庆仍以“老冒”称之。

□ 摘自“文革研究网”

【运动记愧】

历史深处的来信

• 朝格图 • 杨继斌 •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化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们。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的A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B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A叫B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选择跳崖而死。“B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但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近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从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秋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或也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10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1966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

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李煌果老师，曾经单独找他谈话，建议他不要狂热。

1 1月3日的郭灿辉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

◇ “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1 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成为老师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白地翻过去了。

初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初二的孩子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高三孩子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

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 致歉者

程璧以及关秋兰已经原谅当年骂过她们的学生了。她们仍像44年前一样称他们为“孩子”。“孩子们”已经年近六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所有纠缠着普通老人的疾病纠缠着这些前红卫兵们。

道歉以及宽恕，使前迫害者与前受害者，在充满人道灾难的往事里结成了同盟。此后，他们能够一同来摆脱残酷记忆的追杀。

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回忆的折磨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会因病床窗户上的铁栅栏而感到不安（这让她想起监禁和私刑）；在硬币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受害者“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当年迫害者的记忆中（胡滨道歉信语）。

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在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胡滨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耐。”

这也便是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远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滨他们要向已经86岁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书致歉。“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申小珂在信中说。

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在1966年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数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园惨剧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说。此次当年的红卫兵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亦是王通过南方周末首度对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行动，红卫兵们虐杀死者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手段包括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

很多恶行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北大附中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已经怀孕，红卫兵们把她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强迫十多名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

基于尊重死者以及读者，此处省略更为匪夷所思的暴行。从申小珂他们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申小珂在另一封信中说。

◇ 沉默的大多数

但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迫害者。很多红卫兵当年尚是未成年人。一个14岁的少年欢迎“停课革命”，仅是因为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另外一些人仍然坚信“文革”的正当性。“所有的指令都来自最高层，怎么可能错呢？”重庆的一名前红卫兵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在1966年的校园中，充满着亢奋。每个革命者的头都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受害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今天，程璧他们也不愿更多的提及当年的经历。很多研究者都提及过人们对于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这甚至成了这段历史研究的主要障碍，王友琴说，“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记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老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后，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年轻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学杨某父母“有问题”，同班的红卫兵在黑板上写了“杨狗，勒令你每天扫教室”。

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友琴试图解释这些暴行的“理由”，这名女中学生当然解释不了。于是她决定把这些都写下来。“文革”结束后，王友琴考进北京大学，买了第一辆旧自行车之后，第一次骑出校门，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学。1966年8月17日，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坏领袖纸像，被打还被和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我见到了那个喷水池，池中没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积着枯叶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鹤则早已被砸了。”

◇ 由真相而宽恕，由宽恕而拯救

忏悔者则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遗忘斗争着。而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些当年的受害者所做的忏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儒，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万邦儒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校长便去世了。”王友琴说。

关秋兰是另一个作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学校一位名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后来，李洁被红卫兵虐待至死。关秋兰老人因当年没有帮李洁说话而后悔。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同事的死做点什么。

更早的私人之间的忏悔和和解，这些年一直在当年的红卫兵的重灾区发生。199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间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重庆企业家席庆生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亲眼看到母亲被人打死。后来找到了枪手，他们兄弟甚至摸清了枪手的生活规律，打算把枪手绑到偏僻处处以私刑。但一直没有动手，拖着拖着，反而没有这个冲动了。“人上年纪了就更理性了。”

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令让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变。这几乎也是他们这一波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只是在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

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红卫兵道歉时，将之称为一个“良好的开始”。——是的，如果相对于红卫兵的庞大规模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深远伤害，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想，文革后的我们，对受难者的死亡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王友琴说。

著名的伦理学家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依据他的理

论，宽恕抑或和解，并非不计前嫌不记过往。“宽恕是一种拯救，它将每一个人都从往昔灾难的阴影里拯救出来了。”

可以预见的是，已经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围观者，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辞世。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这个地球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她更加强大，也必将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当程璧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一行行扫过拿着申小珂给她的道歉信时，应该有另外一个放大镜扫过1966年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在真相的基础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样。

□ 原载《南方周末》2010.11.5

~~~~~  
【不堪回首】

### 红卫兵忏悔记

• 王 波 •

羞愧难当的心情，差不多困扰了申小珂整整20年。

11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家里，当年的红卫兵申小珂一边踱步，一边反复陈述这种羞愧之情。他已经63岁，经常咳嗽，说话也不如以前利索。

这种“羞愧”感，从1990年开始，在他心中徘徊不散。最终，在2010年4月20日，申小珂把纠缠了他20年的感觉装进一封道歉信里，托人带给了87岁的程璧。

一封信掀起了44年前的往事，也掀起了装在中国许多人心里的波澜。44年前，程璧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党总支书记，而申小珂是该校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从那年8月开始，他们还分别拥有了另一个身份：程璧是台上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申小珂是台下振臂高呼的红卫兵。

◇ 那是学生的耻辱，也是老师的噩梦

在那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校园里，1964年入校的申小珂待过4年，但他与程璧的直接接触只有两次。这两次的情景，他在44年后写道歉信时仍然记得特别清楚。

一次是班里几个男同学把程璧叫到他们宿舍，问程璧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程璧回答说“执行了”，别的同学说她“没执行”。而当时在同学中“懂理论爱文艺”的申小珂，也参与训斥程璧，提醒她“真理有阶级性”。

另一次则发生在教室里。19岁的申小珂教训了43岁的程璧。他事后回忆，自己当年用来教训老师的思想，其实“极左”。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在给程璧的信里，申小珂如此陈述这两次接触。

44年后，他唯一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是，他没有打过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当时，申

小珂的妈妈田绿萍在深夜经常听到附近服装厂里传出有人被打时的惨叫声。在北京某大学担任系总支书记的田绿萍一再告诫当红卫兵的儿子，“在学校千万别打人”。

这也让申小珂觉得自己“犯错不大”，“压力轻些”，也最适合写这封道歉信。写信的过程，是重新审视往事的过程。他回忆，自己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稀里糊涂”，直到后来了解些历史，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他如今看来，“当时大部分同学内心没把老师当坏人，只是跟着瞎喊，喊得声嘶力竭装样子。”

也是在这声嘶力竭的喊声中，程璧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幼儿园女工刘桂兰被活活打死，教导主任姚淑禧在多次遭到毒打后，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据后来媒体报道，在北京地区，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虽然没有参与打人，但这些往事，依旧烙在了申小珂的心中，在1968年伴随着他到内蒙古插队，在1970年又伴随着他来到湖北。离校后，他便与程璧等人失去联系，直至他写这封道歉信。

在信里，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过去的事，我不愿提起，因为这是我们——您的学生——的耻辱。我相信，您更不愿想起，因为那是您的噩梦。”

不少人对当年所做的对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在前24年里，申小珂并没有这种“耻辱”的感受。

他的父亲沈毓珂，自1970年起担任湖北省十堰市市委书记。申小珂也在这一年来到十堰，后来又进入华中工学院半导体专业学习。由于喜欢理论和文艺，在十堰半导体厂和二汽产品处工作了10多年后，申小珂决定不再跟车灯、喇叭和收音机打交道，申请调到产品处宣传科。

在这个岗位上，他获得了充足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时间。虽然往事一再在脑海中浮现，他起初并没觉得羞愧。他说：“那时候，社会没放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有限，所以对自己当年那些言行的认识，也就非常有限。”

转变发生在1990年。那一年，申小珂的弟弟准备写一部革命题材电视剧。由于父亲曾担任朱德的秘书，他的弟弟便去拜访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了解一些革命事迹。据说，康克清曾鼓励他的弟弟，写东西时可以再放开一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可以有更多思考。

这些对话传到爱好文学的申小珂耳朵里，对他触动很大。早在父亲担任十堰市市委书记期间，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生前曾来家里做客，聊起包括“文革”在内的往事，也多有反思。如今，这些话又重现在耳边。

这一年，申小珂已43岁，他决定开始认真审视身后的历史。一有机会，申小珂就看各种回忆录，看党的文件。他客厅的书架上，既有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皮尔的《科学史》、弗拉基米罗夫的《延安日记》等历史书。其中不少，是他从亲友或宣传官员那里要来的。

据他自己回忆，正是通过这些书，他才渐渐看清了自己身后那段经历和历史的面目。他也开始为自己和同学当年的行为耿耿于怀，感到“痛心”。在2007年退休后，这种“痛心”的

感觉日益明显，他身边却并没有太多人可以交流。

2009年，申小珂得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建了一个校友网，申小珂迅速在网站注册，并与不少校友取得了联系。

他们大都是退休的老人，有充分的时间反思过往。聊起往事，申小珂才知道，“内心一直很痛苦”的人，不止他一个。那些当年曾在家批斗父母、带同学抄自己家的人，格外自责。

尽管电脑使用得都不熟练，这些老人在网上非常活跃。他们在校友网上发帖子，写很长的反思文章通过邮件交流认识，较起真儿来，甚至不甘心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这个过程中，申小珂感觉到，“不少人对当年所做的对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有个外地的同学，跟申小珂提起自己当年踹过姚淑禧一脚的事，忍不住在电话里嚎啕大哭。也有人跟他聊起，自己当年曾打过程璧，申小珂动员对方去道歉，对方却不愿去，说“开不了口”。

看到这些老同学的内心煎熬，自认“犯错不大的”申小珂，决定给当年的老师写一封道歉信。在他看来，那些打人的同学，思想压力太大。“他们与其说自己想写道歉信，不如说希望有人写信，替他们表达道歉的意思。”

◇ 我们这些批斗过老师的学生，怎么去面对老师

很快，写这封信的契机就出现了。

今年校友们要纪念北京外国语学校建校50周年，年初便有校友在网上商量庆祝事宜。其中一个提议，是派一个校友采访组前去拜访老书记程璧。看到这一消息，申小珂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当年批斗过老师的学生，到时候怎么去面对老师”。他顿时有了给老师写道歉信的念头。

4月20日，申小珂花了一天时间，在电脑上敲完了这封1780字的道歉信。第二天上午，在斟酌修改后，他给平时联系较多、参与校友采访组的郁小培发了电子邮件，附上这封信，表示“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就请你打印一份，在你去看她的时候带给她”。

在邮件最后，他叮嘱郁小培，“我希望只有你一人知道为好。”

5月31日，在程璧家采访快结束时，郁小培拿出了这封用A4纸打印好的信。为了方便年迈的程璧阅读，她特地放大了字号。校友曹雪寒怕老人眼神不好，把信接过来，挑重要的念给老人听。

听完信，程璧非常吃惊，她告诉眼前这些60岁左右的“孩子”：“小珂是好孩子，我印象中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

这些“孩子”走后，老人激动地拿起放大镜，一遍遍地看信里的内容。当晚，在离开学校42年后，申小珂通过电话再次听到了老师的声音。老师告诉他，“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

而申小珂给程璧书记写道歉信的消息，很快便在校友中传开了。不少人要求看这封信。在做了一些修改之后，这封信被发在了校友网上。

远在海外的胡滨，看到信后，也给程璧发来了邮件。这位当年高三（三）班的学生，是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在1967年到1968年，有一部影响很大的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申小珂和胡滨都是主创人员，在学校里很有名。胡滨在邮件里表示，“诚恳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并“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

程璧算了算，写道歉信的红卫兵虽然只有这两个，但赞成与附和他们的道歉信的，有10多个。

◇ 认清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错误，我们才有真的自由

87岁的程璧，看到言辞恳切的道歉信后，则尽力为昔日的学生们开脱。

“归根结底，他们受骗了，被愚弄了。他们都是好人，现在出来道歉是因为从根本上认识到了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错误。”她说，看到“孩子们”带来的信，她很感动，并感觉特亲切。

6月14日，她给申小珂和胡滨写了公开信，并托学生在校友网上发布。她说，“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而申小珂也解释，“我们的道歉，一方面是糊涂人对程书记们的忏悔；一方面是对糊涂人的解脱。”

这封信成为一把钥匙，把许多人心里紧锁多年的那扇门打开了。9月18日，在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上，当年踹过程璧一脚的一个学生，专门到老人面前表达歉意。老人为了减轻学生心里的负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没事的，很轻的。”

校庆活动结束后，申小珂带着夫人，去了程璧家。问及那些痛楚的往事，老人已经不愿细说。临别时，看到申小珂只穿着短袖衣服，老人拿出儿子的衣服，给申小珂穿上，又帮他扣上扣子。

更多道歉也在继续着。10月9日晚上，申小珂把写给雷力的道歉信发给一位校友，托他转交。当时，副校长雷力和程璧被关押，申小珂曾是看管他们的“典狱长”。雷力先前曾对申小珂有很多帮助，但当很多人批斗雷力时，申小珂也给他写了一份大字报。

申小珂一直想找机会解释这封大字报的意思。但这些想法在心里藏了44年后，他已经没有机会当面作出解释。在校庆纪念活动现场，90岁的雷力揪过申小珂的胸牌，看了看名字。申小珂原本以为老人认出了自己，想跟他表达歉意，结果老人已经不认识他。有校友告诉他，当年饱受折磨的雷力，如今不仅反应迟钝，耳朵也聋了。

申小珂给程璧的道歉信和程璧的回信，日前也在媒体上被公布，并引起人们关注。在赞赏声中，有人指出，该道歉的是那些打人的红卫兵，申小珂和胡滨没打过人，是好红卫兵，不应该道歉。

对此，申小珂并不认同。他说：“我没打人，但我训过人。如果当年我做的事情有一点点道理，我也不会道歉。我们做得毫无道理。既然自己知道毫无道理，你就必须得道歉。”

在羞愧和耻辱中煎熬了20年后，申小珂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他并不认为可以就此停止

反思，因为他觉得，只有认清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错误，“我们的道歉才道在点子上。我们才有真的自由”。

□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0.11.10

~~~~~

【博文文选】

南方周末的头版文章震动我的心

• 中华新青年 •

今天下班后，我在报摊买了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头版的标题是“历史深处的来信一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文章报道了一群当年殴打老师的红卫兵向当年被打的老师道歉。几位被打的女老师现在都80多岁高龄了，当年的学生都60岁了。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据官方数据统计，仅在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1772人，民间的统计数字要高得多。这几位老师在暴力狂潮中侥幸逃得性命，而她们的一些同事则进入了死亡名单。

郭灿辉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当年对女教师李煌果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阴阳头，从家里揪出来跪在10厘米宽的木板上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当年参与打人的红卫兵给老师写信表达了忏悔之情，84岁的程壁老师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非常感动，她在回信中说“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老师原谅了学生，81岁的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会有所反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称呼已年过花甲的学生们。

一位学生写道“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另一位女生在信中说“每个人都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能就这样不清不白地翻过去了”。

很多恶行是难以置信的，已经怀孕的刘美德被红卫兵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到她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另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被一个红卫兵用军用皮鞋碾踩。卞仲耘、胡志涛、刘志平、梅树民和汪玉冰五名教师被活活打死，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死，用锅炉房里提来的开水烫死。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生吴芳芳不小心弄坏了领袖的纸像，被毒打后与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

从申小珂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都是犯错不大，没有命案的人。但更多的人在过去四十四年里保持了沉默。一些人仍然坚持当年革命的正当性，他们从暴力的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直到现在，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道歉，而且有些人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看到这里，我的心被震撼了。我想到那些无辜死难的同胞，想到网上那些死不悔罪的老左派。在乌有之乡和强国论坛深水区，那些沾满同胞鲜血的家伙对那个罪恶年代无比怀念，在今天竟然把自己装扮成爱国者和所谓的公平正义的代言人，稍微懂点历史的人还能相信他们的谎言吗？

一位学者问《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对受难的同胞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怎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我要说没有，作为一个网友我很清楚。网上那些老左派不但不悔罪，对坚持正义的网友百般辱骂。他们不承认历史事实，一律说是造谣，百般抵赖。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对于那一段历史始终遮遮掩掩，不敢正视，更不必说从中汲取教训了。现在，经历过那一个时代的人都逐渐的走进暮年，如果再这么沉默下去，真相会随着他们的离开而永远迷离。

在真相的基础上走向民族内部的和解是《南方周末》的希望。发自内心的真诚道歉，预示个体反思的开端，是一种姿态，亦是一种勇气。在这个习惯动辄疯狂的国度，难能可贵。不为虎作伥，不作恶，悲悯向善，独立思考，而不是以各类鼓惑人心的口号剥夺他人的权利乃至生命。

网友们可以看看《南方周末》的这篇专题报道。对我们了解历史，分辨善恶是大有裨益的。

□ 转自《天涯社区》发表日期：2010.11.7, 15:48:00

※ ※ ※ ※ ※

我在强坛首发的帖子《南方周末的头版文章震动我的心》前些天在天涯杂谈上转发后，引起强烈反响。该帖点击5万多人次，回帖780个（编辑删除了一部分回帖）。网友们对红卫兵的暴行感到十分震惊，网友们纷纷揭露和声讨文革的滔天罪恶。

网友“CTU托尼”说：“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充分诠释了“人性本恶”这个词！文革时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男老师被学生用五寸长的铁钉从头上钉下去，钉完钉子后这位老师被一大群学生丢入河中。”

网友 youwalkin 说：“对文革知道不多，父母对此闭口不谈，我现在也快30了 但是我从我中学同学听到过他家文革中的故事，他父亲的养父母是工程师。有一天，他父亲那时还在读初中吧，回到家发现养父母双双悬梁自尽了，被逼死了。全中国这种事情应该数不胜数。”

网友“摩尔人的叹息”说：“我不算经历过文革，应该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小时候批斗打骂我母亲学校的老师的场面还是依稀记得。那位可怜的女老师，就因为少说一个字，他让学生把毛主席像挂起来，说成“把毛主席挂起来”，结果被批斗，打瞎了一个眼睛，断了一条腿，终身残疾。”

网友“风中颤动的麦芒”说：“谁说文革期间老百姓的日子好过？谁说那个年代挨批挨打的都是当权者？？我外公就是和老舍一样的遭遇，批斗凌辱和殴打之后，不堪其辱才跳水自尽的！！批斗我外公的理由是说我外公是国民党特务，而我外公只不过是解放前在铁路上当过几年的文员而已。解放后我外公靠推个小车买点小菜之类度日。那个年代的荒唐和疯狂，那么多无辜者的血泪，罄竹难书!!!”

网友“蓝色懒散”说“向死去的同胞致敬，更对那些不知悔改的刽子手表示仇恨与鄙视，他们不觉悟就永远也得不到中华民族的原谅，最终这桩历史的闹剧会被永久的钉在民族耻辱柱上。”

网友 taersi 2 0 0 3 说：“我们一直在谴责日本为什么不给中国人道歉，为什么不认罪？那中国人对自己人犯下的罪呢？道歉了吗？反悔了吗？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到？”

网友“一条名叫汪达的鱼”说：“这一页历史不能就这样不清不白地翻过去了，否则这样的人间惨剧还会重演。一个民族要想发展和进步，就必须面对历史和反省过去。”

网友“实践中庸”说：“强烈建议修建文革纪念馆。不检讨文革就没有对道德沦丧负责，不检讨文革就没有对岌岌可危的民族文化负责，不检讨文革就没有对真相负责。只有全民吸取文革的教训，才能逐步重塑民族精神，回复礼仪之邦的辉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是民族的凝聚力。”

网友“蚂蚁背钢琴”说：“据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 8 年抗战的总和。可我们的历史书中却只是一笔带过。人民会记住的，历史会记住的，请当局正视过去的是与非……”

7 8 0 多条回帖，我无法一一列举，从网友们的回帖中我看到一颗颗赤子之心，一颗颗正义之心。天涯杂谈并不是一个时政论坛，而是一个以八卦、生活、社会热点为主的年轻人居多的论坛。年轻的人们是能够分辨善恶的，他们与强坛深水区的老左派是两个世界的人。在乌有之乡和强坛深水区，那些沾满同胞鲜血的老左派死不悔罪，对那个罪恶年代无比怀念。他们在今天竟然把自己装扮成爱国者和所谓的公平正义的代言人，稍微懂点历史的人还能相信他们的谎言吗？

一位学者问《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对受难的同胞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怎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我要说没有，作为一个网友我很清楚。网上那些老左派不但不悔罪，对坚持正义的网友百般辱骂。他们不承认历史事实，一律说是造谣，百般抵赖。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对于那一段历史始终遮遮掩掩，不敢正视，更不必说从中汲取教训了。现在，经历过那一个时代的人都逐渐的走进暮年，如果再这么沉默下去，真相会随着他们的离开而永远迷离。

在真相的基础上走向民族内部的和解是《南方周末》的希望。发自内心的真诚道歉，预示个体反思的开端，是一种姿态，亦是一种勇气。在这个习惯动辄疯狂的国度，难能可贵。不为虎作伥，不作恶，悲悯向善，独立思考，而不是以各类鼓惑人心的口号剥夺他人的权利乃至生命。

强坛的网友和斑竹们可以去天涯看看这篇帖子及其精彩回帖，对我们开拓眼界，分别善恶是有所帮助的。

□ 转自《强国论坛》2 0 1 0 . 1 1 . 1 1 , 2 1 : 5 7 : 0 8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